

## 《霍华兹别墅》的“连接”主题

阮 炜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文坛上，工商金融阶级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产生了专与这个阶级作对的有着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肖伯纳与高尔斯华绥等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尽管十九世纪中下叶马修·阿诺德和托马斯·卡莱尔等著名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这个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而权势日增的阶级作了强烈批判，但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则寥寥无几。狄更斯在其早期作品里鞭挞了没落腐朽的贵族阶级，对下层贫苦大众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则抱着比较乐观的态度。直至在《艰难时世》和《我们共同的朋友》等晚期作品中，他才对资产阶级表示了失望，对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体系才作了毫不含糊的批判，并将美国社会结构上的缺陷以及各种社会弊端归咎于这个阶级的统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下叶英国文学家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基本上是从经验和直感出发，没有上升到阶级意识的理论高度，伴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文学家（或知识界）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便是基于比较明确的理论，是系统的、执着的、强烈的。这种针对资产阶级的浓烈的批判精神左右了英国文坛，批判“有产业的人”成为时髦。正当其时，爱·摩·福斯特（E·M·Forster）在这场颇具声势的合唱中却发出了不和谐音。

在《霍华兹别墅》（*Howards Ends*, 1910）中，福斯特把从事工商金融活动的实业人士与知识分子看作相互之间既有着严重分歧、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同时阶级中的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并按其本质上所固有的弱点各打五十大板。小说基本上是从玛格丽特·施勒格尔一叙述者—福斯特的视点展开故事情节、表达中心思想的，而要为福尔赛们打抱不平的意图在下面玛格丽特与她的妹妹海伦的一席话中表现得最为明白无误：

要是英国千百年来没有威尔考克斯的劳作生息，你和我就不可能太太平平地坐在这里，也不会有火车、轮船供我们文化人乘坐，甚至不会有田园土地，而只有野蛮蒙昧。不，恐怕连这也没有。没有他们那种精神，生活也许永远不可能摆脱原始状态。我越来越感到不能既领取我的收入又对保障这种收入的人嗤之以鼻！①

当然，玛格丽特同比她年长几十岁的威尔考克斯家族的中心成员亨利结婚则从实际行动上证明她的慷慨之言绝非出自一个文化人的心血来潮。但有文化修养的施勒格尔姐妹与讲求实际的威尔考克斯一家之间在精神气质上的明显的不一致使玛格丽特与亨利的结合又显得勉强。玛格丽特是福斯特表达小说思想的主要喉舌。她父亲是德国人，但他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德国人，“如果人们一定要将他归类，他就是黑格尔和康德的同国人，是理想主义者，喜好想入非非。”（21页）②这样的知识分子父亲使玛格丽特成为知识广博、善于思考、感情丰

富、富于同情心、没有狭隘民族主义观念的人。而威尔考克斯家族的主要代表亨利及其长子查尔斯则思想肤浅、狭隘，缺乏想象力和同情心，但却干练精明，不尚空谈。显然，玛格丽特与亨利分别属于文化与实业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是什么把玛格丽特吸引到海伦感到绝然不能容忍的实业的世界的呢？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玛格丽特与亨利发生了密切接触。她越来越感到他身上有许多自己不具有的可贵品质，这就是脚踏实地和坦率。她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能够“看见事物的全貌”的优越地位，是那些埋头于实业因而只能看得见事物的局部的人们所造成的（138页）。于是，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针对实业人士的报恩的意识。至少，她不能象一般知识分子，以不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她也并非看不见工商人士身上固有的种种弱点，但通过与亨利的婚姻，她试图改造他，同时也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实在，更为丰富。很明显，玛格丽特与亨利的婚姻象征着文化与实业的结合。中产阶级中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试图从对方身上寻找可以弥补自身弱点的因素（在这一点上，玛格丽特尤然），从而求得一种较为完美的新人格。福斯特推出这种新人格的意图不外乎是寻求一个补救工业文明带到人际关系中的种种离异、种种不协调的方法而已。

中产阶级中层的玛格丽特与中产阶级高层的亨利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气质上的互补关系，是因为前者拥有文化，后者拥有经济实力，双方能够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霍华兹别墅》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保险公司小职员伦纳德·巴斯特属于中产阶级的最下层。他似乎什么也不拥有。他之所以是小说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人物，不是因为他一点文化也没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具有的文化太肤浅，刚刚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向往文化的人。他在施勒格尔姐妹家做客时，不合时宜地、迫不急待地显露自己零碎的书本知识，让两位女主人既觉得可笑、又觉得可怜。当然，经济拮据也是他悲剧性结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许还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些评论家认为巴斯特只是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因为他的原型显然不是福斯特生活圈子里的人，所以福斯特对他的处理是马虎的。有些评论家还认为海伦委身于巴斯特是不可信的，因而是小说的败笔。持上述观点的人对书名页上的警句“沟通吧”（或“联系吧”、“连接吧”，原文为“*Only Connect...*”）似乎重视不够。呼吁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是《霍华兹别墅》的核心主题，为实业人士讲几句公道话只不过是与此核心主题密切关联的次要主题罢了。从小说的故事情节看来，巴斯特是表达“沟通吧”这个主题的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施勒格尔姐妹（特别是玛格丽特）是小说中沟通、联系“运动”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在福斯特看来，一个人无论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阶层、哪个类别，他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本质上都是有七情六欲、渴望理解与交流的。在商业主义的时代，人们由新的价值观念所主宰，那种本质上的欲望或需要麻木了，迟钝了，因此离异、分歧、不和谐便成为普遍现象。福斯特抛出施勒格尔姐妹这两个人物上与威尔考克斯家族、下与巴斯特“联系”，充分说明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巴斯特在表达“连接吧”这个核心主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虽然不能说是最重要的，至少也与其他几个主要人物的作用同等重要。他所谓的“妻子”曾经是亨利的情妇。假如这只是一种巧合性的联系，因而不太实在，他与海伦的私生子则是他与施勒格尔姐妹、乃至威尔考克斯家族之间的一条结实的纽带。因此，巴斯特与海伦的私通犹如小说中其他许多巧合与邂逅，虽然不十分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情况，却是传达主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诚然，由于福斯特不熟习现实生

活中象巴斯特一类中产阶级最下层的人物，他对巴斯特的塑造因而基本上是粗线条的；《霍华兹别墅》中三种类型的人物相互间基本上是邂逅相识的；但接近故事尾声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十分错综复杂，巴斯特与海伦的小孩更使三方面的人成为亲戚。这样的事实充分说明巴斯特绝非小说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次要人物。然而，基于这样的故事结局，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福斯特所呼吁的“沟通”已经实现了呢？施勒格尔姐妹之间就巴斯特有下边一段对话：

“我们当真要同巴斯特继续往来？”

“我不知道。”

“我想还是不要的好。”

“随你的便。”

“我想没什么好处，除非你当真打算去了解他人。……情绪激昂时，我们同他相处得很好，但得考虑一下理智的交流。我们不能拿友谊来消遣。不，没有好处。”（101页）

在这里，玛格丽特以谨慎的态度看待同巴斯特的关系，也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海伦则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她以后同巴斯特的私通也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巴斯特死后，海伦认识到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但也清楚地认识到直到现在，她也不爱巴斯特：“装模作样不是好事，我正在忘掉他。”（266页）无疑，海伦的轻率是导致巴斯特之死的直接原因之一，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引诱了他，我杀死了他。”（266页）在这个意义上，查尔斯打击巴斯特所用的佩剑就不单纯是致人于死地的工具了。巴斯特死后，亨利问查尔斯那佩剑是谁的，后者答到：“是她们的刀。……我用她们那支旧德国佩剑击中他的肩有一次或两次。”（259页）佩剑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海伦的感情用事帮了巴斯特的倒忙，而这种帮倒忙不仅在于同巴斯特私通（“引诱”巴斯特），还在于以不可靠的咨询劝他退出保险公司。玛格丽特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清白。为巴斯特向亨利请求业务咨询以及劝他退出保险公司，是姐妹俩一块干的，正如那佩剑是她们俩人的，是她们家族的，而不单单是海伦一个人的所有物。当然，过错也不全在施勒格尔姐妹。亨利提供咨询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出事后又拒绝承担任何义务，甚至连玛格丽特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替巴斯特找一份差事的要求也不答应。查尔斯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便无庸赘述了。

巴斯特的潦倒乃至死亡的原因也得在他本人身上找。查尔斯用佩剑击中他后，他顺势把书架拉倒，架上施勒格尔姐妹十分珍惜的祖传书籍纷纷坠落在他身上。这个场面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如前所述，巴斯特的书本知识是十分肤浅、十分零碎的。对此，小说叙述者作了讥讽的解释：“他的头脑就同他的驱体一样，从来就没有喂饱过，因为他很穷。”（35页）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他有过接受教育的机会；但处在这个阶级的“极端的边缘”，（34页）他所受到的教育又远远不足以同施勒格尔姐妹这一类“文化人”相提并论。于是，文化对于他，正如同情他的施勒格尔姐妹对于他一般，仅仅是他倾慕的对象，向往的目标，丝毫也不能加强他的社会地位。音乐会是中产阶级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巴斯特同施勒格尔姐妹的认识正是在一次音乐会上。大家兴致勃勃地倾听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还有勃拉姆斯、门德尔松以及埃尔加的曲子。显然，这是一个高雅的“文化”场合。巴斯特与施勒格尔姐妹关系的加深则是在她们家高谈阔论的时候。正是同她们谈话后，他才深深地卷入那个很快把他推向死亡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亨利的咨询使他陷入赤贫，查尔斯用佩剑打击他引起他心脏病的发作，而埋葬他（当然是象征意义上的埋葬）的却是他所信赖、爱慕的施勒

格尔姐妹的祖传书籍。然而，对文化的向往似乎还不是巴斯特的悲剧命运的最根本原因。在第六章的开首，叙述者以讥讽的语气说：

在他（巴斯特）那个时代，民主制度之天使已经耸然升起，它以坚韧的皮翼给所有的阶级以荫蔽，它向这些阶级宣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这就是说，凡是有雨伞的人（海伦在音乐会上拿错了巴斯特的伞，大家在物归原主的努力中相识）。于是，他被迫表现得文雅，有教养，生怕失足掉进深渊。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价值，也听不见民主制度的种种声明”。（35页）

必须指出，福斯特并不是在挖苦民主制的根本原则。他的意思是，尽管时代的民主呼声很高，而现实情况却是人与人之间并无平等可言；而要达到真正的平等又谈何容易。巴斯特的悲剧是在人人撑体面和生怕被他人瞧不起的社会中，他自己也不得不硬撑体面，而撑体面的主要手段就是要显得有文化。由此看来，致他于死地的不是施勒格尔姐妹的文化修养，也不是她们的祖传佩剑，更不是她们的书籍；也不单单是亨利不可靠的业务咨询以及查尔斯的凶暴。致他于死地的根本原因乃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

如果说施勒格尔姐妹同巴斯特打交道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在与亨利的关系上，她们的努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玛格丽特同亨利的婚后关系是以诸方面的严重分歧为特点的。例如，巴斯特被银行解雇后玛格丽特向亨利提出帮助他的请求被拒绝。事实上，海伦听到姐姐将要同亨利结婚的消息后说过那将是“恐怖与空虚”（135页）一类似乎过激的言辞劝阻她，而玛格丽特对此却不以为然。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稳重的玛格丽特远非完全正确。她同亨利的婚姻的确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危机。这场危机是在发现住在霍华兹别墅的海伦未婚而孕（而且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地位低下的穷职员）之后爆发的。这是夫妻之间一场激烈的道德冲突。当亨利反复表示不让有着强烈的怀旧感、情绪又十分不稳定的临产妇海伦在他的房子里哪怕是住一夜时，玛格丽特痛斥他道：

“亨利：你有过一个情妇，我原谅了你。我妹妹有一个情人，你却要把他赶出你的房子。你明白这之间的联系吗？愚蠢、虚伪、凶狠，——哼，可鄙；有一个人，当他妻子活着时，他侮辱她；她死后，又侈谈如何怀念她。有一个人，他为了自己寻欢作乐毁掉了一个女人，然后又将她抛弃，让她去伤害其他男人。他提供糟糕的金融咨询，然后又说没有任何责任。这些人，哼，就是你。你不能认出他们，因为你看不见事物之间的联系。”（243页）

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为自己的实业界涯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已变得十分麻木不仁。亨利之辈不仅对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活动不屑一顾，而且连起码的道德意识都丧失殆尽。然而，巴斯特之死导致查尔斯锒铛入狱，这在亨利身上毕竟触发了某种良心发现。他不再坚持要海伦搬出去，后来在遗嘱中又将整座霍华兹别墅传给玛格丽特，而后者又将把别墅传给巴斯特与海伦的孩子。由此看来，玛格丽特与亨利“连接”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我们绝不应当夸大这种成功。“连接”毕竟姗姗来迟，显得勉强、脆弱，而它索取的代价又是何其昂贵。在亨利口述遗嘱内容的家庭会议上，福斯特对威尔考克斯家族的成员竭尽揶揄之能事，暗示他们将仍旧是一个个十足的“福尔赛”。巴斯特与海伦的小孩是私生子，我们姑且不论他继承霍华兹别墅的前景是否非常明朗，伴随资本主义文明日益扩张的伦敦城肯定迟早要吞没这座乡间别墅——这座象征文化与实业相互撑腰的房子。在历史发展的无情力量面前，施勒格尔姐妹——亦即福斯特——“连接”的努力只能望洋兴叹。

贯穿《霍华兹别墅》还有一个主题，这便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批判。在这一点上，福斯特与他的同时代文学家之间没有什么分歧。在他看来，这种文明不符合自然，不符

合人情，不仅在人际关系上造成了种种离异，也导致了乡村与城市的分离，文化与实业的分离，更加剧了人身上节制与放纵这两种属性之间那种本质的不和谐。在第十七章开首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土地的封建所有制的确给人们以尊严，而动产的现代所有制则正在将我们变为游牧部落。我们正在向行李的文明倒退。将来的历史家们将会注意到中产阶级不扎根于土地却又财富日增，也许会在里边发现他们想象力贫乏的秘密。（118页）

工商金融阶级与土地绝缘，与资本主义文明导致的其他种种分离一样，的确使福斯特深感忧虑。在这个意义上，《霍华兹别墅》的“连接”或“沟通”主题绝非仅仅针对人际关系而言。施勒格尔们、巴斯特们、威尔考克斯们之间是否沟通、联系起来了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尽管这是最重要的方面。象征人与人，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文化与实业的总体性连接的是霍华兹别墅本身。而这种总体性沟通在《通往印度之路》（*A Passage to India*, 1924）中再次成为核心主题（小说围绕这条主线，在更广的面上和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了哲学、伦理、宗教、种族、国际政治等诸方面的问题）则说明福斯特对问题的关注是深切的。假如说霍华兹别墅是小说中各方面人物之间得以实现“连接”的中心场所，它作为其他方面的联系的象征则主要在于它坐落在田园气氛仍然十分浓厚的伦敦远郊，而居住在里边的种种人物又全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与别墅这一象征意象紧密相关的另一意象是它旁边的草地。有关这片草地，小说结尾有如下一段涵意深远的描述：

人们正在再一次割草。花园里，红色大罂粟又开放了。七月就要到来，那时候，麦株间将会夹杂着红色小罂粟。八月就要割麦了。这些琐碎小事将成为她（玛格丽特）生活中年复一年不可缺少的成分。（265页）

福斯特不仅让玛格丽特返回这种理想化的田园生活，巴斯特与海伦的小孩在这时与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孩子在草地上嬉戏的场面也暗示小说中三方面人物之间所实现的“沟通”的结晶也将采取与他姨妈同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对于这种避开喧嚣的工业文明，返回宁静乡村田园的生活方式的前景，福斯特并不是十分乐观的。小说结尾时玛格丽特有关伦敦的蔓延将会吞噬霍华兹别墅这样一种现实的议论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喜欢移动的风气是在过去一百年里形成的。也许，会有一个没有迁徙现象的文明来取代它，因为这个文明将附着在大地上。尽管现在一切征兆都是不利于这个文明的，我仍然禁不住满怀希望。清晨，在花园里，我每每感到我们的房子（霍华兹别墅）既是过去，又是未来。（268页）

福斯特的语气是无可奈何的。不仅别墅本身将淹没在工业文明的无情的“红色铁锈”之中，而且，正如前文所说，别墅所象征的“连接”也将化为乌有。由此看来，《霍华兹别墅》表达的基本思想——“联系吧”，“沟通吧”——只不过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罢了。小说的基调因此是十分悲观的。它之所以是悲观的，是因为它虽然让我们看见了一线希望，同时却又告诉我们实现希望的可能性十分渺茫。

#### 注释：

① E. M. Forster, *Howards End* (New York, 1985), pp.137.8.

② 本文引文全由笔者所译。以下随文注明引文出处。